

主编●徐新建
文学人类学博士文丛
多民族文学研究系列

博物馆民族志： 中国西南地区的 物象叙事与族群历史

Museum Ethnography: Object Narrative
and Ethnic History on the Southwestern
Frontiers of China

安琪◎著

民族出版社

文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兴起经历了几起几落过程。如果简约划分的话，可以大致分为1905至1949和1949至今的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的成

果是奠基性的。其中的重要人物有闻一多、郑振铎、茅盾等。在「新时期」以来的重启阶段，标志性成果出现了多种类型和面向。其中较为显著的包括「经典重释」、「原型批评」、「文学仪式」、「口头诗学」以及「神话历史」、「多民族文学比较」等诸多方面。

014036341

K280.7
01

主编●徐新建
文学人类学博士文丛
多民族文学研究系列

博物馆民族志： 中国西南地区的 物象叙事与族群历史

Museum Ethnography: Object Narrative and Ethnic History on the
Southwestern Frontiers of China

安琪◎著

民族出版社



北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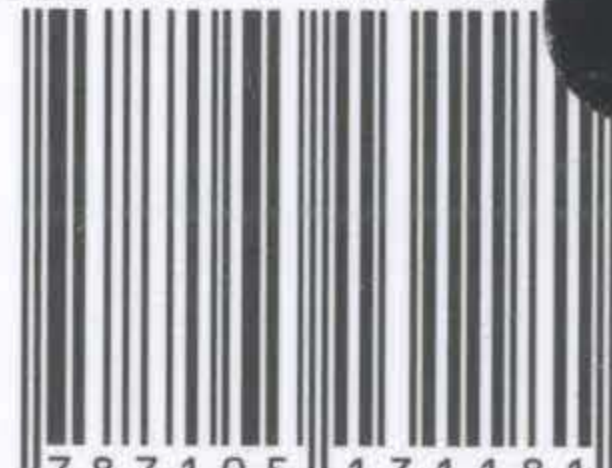
C1715766

K280.7
01

BOWUGUAN MINZUZHI: ZHONGGUO XINAN
DIQU DE WUXIANG XUSHI YU ZUQUN LISHI

本书在中国西南边疆的语境下探讨藏彝走廊地区的族群表述问题，将民族博物馆视作一类以“物象”为载体的民族志文本。民族器物是一种具备自主能动性的介质与社会关系的纽结，它在长时段历史中的变迁（以及附着于此的民俗事项的变迁）为20世纪中国西南民族的族群表述勾画出一幅动态的权力地图。本书主体部分围绕民族博物馆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展开，将20世纪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引入西南边疆的论域之中，深入探寻民族博物馆的“物象文本”如何塑造了族群历史叙事的典范。本书的立足点，在于同时把握“物质文化”与“族群表述”的路径，在两者所形成的张力之间寻求最丰富的解释空间，并由此推进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

ISBN 978-7-105-13118-1



9 787105 131181 >

定价：36.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博物馆民族志:中国西南地区的物象叙事与族群历史/安琪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1

(文学人类学博士文丛/徐新建主编)

ISBN 978-7-105-13118-1

I. ①博… II. ①安… III. ①民族学—研究—西南地区
IV. ①K28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18260 号

策划编辑:石朝慧

责任编辑:石朝慧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100013

网 址:<http://www.e56.com.cn>

印 刷: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220 千字

印 张:8

定 价:36.00 元

ISBN 978-7-105-13118-1/K·2297(汉 1278)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010-58130041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北航

C1715766

文学人类学的中国历程

——《文学人类学博士文丛》总序

徐新建

一、领域交叉：文学与人类学的相互走进

“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学术体制一直处于改造和重建的探索之中。经过百余年的演变，逐渐形成了以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三足鼎立”为根基的一整套学科体系和教研分工，以至派生出近似于画地为牢式的相互界限。如今，由于受到来自学术内部的不断挑战及源于社会现实的需求影响，既有的体系和分工又卷入了新一轮学科交叉与重组的浪潮。这个浪潮冲击广泛，对各门学科皆有影响。当代中国的“文学人类学”可视为较为突出的体现之一。

近代以来，包括文学、人类学在内的诸多领域经过长时间的中国化、汉语化，已大致完成了语言和术语的本土转型。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人们已能够熟练地用汉语来讲述文学和人类学，也就是民族国家的表述问题，但其实这表象后面掩盖着一种本相，那就是很多人忘记了当今以汉语呈现的学术样式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西学引进的一个倒影。表面上的东方之路，其实是“literature”（文学）和“anthropology”（人类学）的异邦镜象和模拟。所以，随着世界性的学科交叉与门类重组时代的到来，文学与人类学这两个表面看去

距离甚远的独立门类，不约而合地迈出了相互走进的步子。此种趋势在当代中国也有体现。正由于从引进之初就深深烙上的西学印记，看似已本土化了的文学和人类学同样呈现出彼此的交叉和兼容。

在当年“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张之洞撰写的《劝学篇》就提到“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后来的康有为则强调“西学甚多新理，皆中国所无，宜开局译之，为最要事”。在此风气之下，从晚清起逐渐创办中国的高等学府基本以西式的学科分类为基础。在其中，文学始终占有独立和重要的位置，可称为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人文学代表，同时还肩负着进行社会动员与改造国民性的使命。新中国建立后，文学被划归到中文系和外文系，成了承继本土的平台和了解世界的窗口之一。中文系的全称本是“中国语言文学系”，但由于在地域、观念及师资方面的局限，在很长时期里，国内大部分高校，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等名牌大学，都仅有其中的一个“汉语言文学专业”，无法实现对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完整呈现和传承。与此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院校设立的课程里，往往只突出本地、本族的单一语言、文学和文化，也缺乏对中国文学的整体教学。

这种二元对立式的文学划分不利于多民族中国的文学阐释和传授。于是随着国家民族团结政策的确立和推进，作为学科和教育门类的中国文学终于在与民族学、人类学联手交汇的互动下，实践着学科的交叉和兼容。另一方面，随着新时期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往相对封闭的外国文学教育又在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推动下，兴起了突出国别差异及关联的“影响研究”与强调学科对话的“平行研究”，同时还倡导注重全球关怀的“世界文学”远景。这些新现象的出现既为文学与人类学的整合提出了明确的时代要求，也提供了坚实的社会支撑。

经过老中青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以新兴交叉学科为特征的文学人类学已成为列入教育部学科目录的新成员和新平台。自1993年

成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下属二级学会的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后，陆续在四川大学、厦门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若干院校设置了文学人类学的学科点和研究基地。这些院校和机构不但开设志在打通文理、兼容中外的文学人类学通识课程，招收和培养跨学科的硕博硕士生和博士后学者，而且开展了一系列注重国际交流、强调田野实证的学术活动。2012年暑期，各地机构还联合创办了经教育部批准的首届高校教师文学人类学培训班，与来自国内高校的青年教师一道研讨文学人类学的基础理论和前沿话题。

二、“文学”之问：对汉语名词的翻译反思

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如果出一道试题来考，答案必将是五花八门。对此，学术界的争论很激烈，前一段又把焦点转向了“文学性”。人们试图由此界定什么是文学，并进而回答网络、手机、短信乃至广告词语等等是否算文学。有人说算，因为文学是在发展的。另外的人则坚决反对，理由是不能把文学泛化了，文学的本质是审美。可见，在什么是文学的讨论中没有共识。不过许多人没注意到，在讨论“什么是文学”的时候，需要先界定“文学”这个词语本身。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对西方世界的“literature”加以对照，我们无法理解什么是汉语所说的“文学”。在近代以前，中国人并不使用“literature”这个概念，也不刻意去说“文学”。在大多时候，用一个“文”字就足已。在《文心雕龙》里，“文”的含义很广，而且自足，很难与“literature”对应，甚至可以说有所超越。其他双声的词语，如“文章”、“文采”、“文笔”、“文韵”，乃至“文理”、“文道”等都彼此相关但又各有特指。那么，近代中国为什么要淘汰其他，单单留下或凸显“文学”一词呢？从话语更迭意义上讲，这体现了一种学术的谱系性“失语”。我们没有话讲、讲不出话了，只好用翻译过来的新词来表述亘古的意思和跨国的问题。

然而作为翻译，“文学”这个词是有问题的。与“化学”、“算学”、“群学”等其他近代译词相似，文学的词根是“学”，也即强调其是一种学问和一门学科，这就与“literature”在西文本义里将其归为艺术的划分发生了冲突，混淆了抽象的学理与形象的创作，致使翻译过来的汉语含义不伦不类。

所以在我看来，现代汉语的“文学”是一个有问题的假词。问题在哪里呢？就在文学的“学”。如果把文学视为艺术，再有一门关于文学的学问和学科，那它应该叫“文学学”，作为研究文学的一门学问，就像物理学是研究物理的学问一样。由此引申，现在使用的“比较文学”同样有问题，作为一门关于文学比较的学问，其也应该叫“比较文学学”。

三、“人类学”追问：对西学东渐的学科质疑

与文学人类学相关的另一个领域是人类学。我相信在这个开放的时代大家对人类学不会一无所知。如今这个词的使用已越来越广泛了，连在广西举办的“国际民歌节”都在使用。从官方到民间，从学界到媒体，人们大量地把人类学当做知识用语和解释工具，用人类学的方式去研究广西民歌、阐释“黑衣壮”，乃至打造旅游景区的“印象刘三姐”。所以可以说大家对人类学这个词并不陌生，但是相对于“文学”而言，我倒觉得很可能大家对人类学的含义了解更少。

我想强调的是，我们需要把人类学放到至少跟文学并置的相关背景中，把它视为一个同样很有分量、同样很丰富、同样很悠久，同时也同样很复杂的学科体系去理解。跟“文学”一样，对于汉语世界来说，无论作为术语还是话语体系，“人类学”也是引进的，只不过它更鲜明地能让人从词语表面感到它的非本土性，因为在中国的文学典籍里面，在各位的阅读经验里面可能搜寻不到这个词。

在此我简要介绍人类学的分类。在中国引进的人类学比较通行

的有四个部类：

1. 体质人类学或者叫生物人类学。它偏重于自然科学，它研究的是人的种属、起源及演变、分布，乃至基因遗传等等。在这方面，假如有人想要确认南方某一民族在体质上的特征，那他或许就会接受体质—生物人类学训练，然后由此出发，从相关族群中挑选一些成员标本来测量身高、血型甚至基因等，然后通过分析比较得出相关结论。这是人类学比较经典的一种方式和门类。

2. 考古人类学。作为主要关注人类远古文明及消逝的文化遗址的学问，考古人类学对全世界的知识谱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它以科学实证的方式构建了史前文明，从而在世界各地为不同人群构建出既统一又有别的“史前史”。对于历史悠久，自认为万世一系的中国，该学科的影响也非常重要。从周口店猿人的化石发现到仰韶、红山等多处史前遗址的出土和解读，在学术和政界激发的一个心愿，就是如何把“上下五千年”的大一统历史由传说和想象朝科学实证的方向坐实。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都希望通过考古来形塑各自的文化传统、凸显本地身份、增强社会资本，也就是把考古当作了一种重写历史的实用工具。最近中央电视台节目组加入对某些古代名人墓发掘的现场直播，体现的就是这种文化参与和经营。人们都把本属于人类学一个分支的考古视为新的竞争力，为什么呢？就在于考古能够发掘出地下文物，而地下文物不仅可以卖钱，更是一种强有力的话语，可以传达出其他文字方式无法言说的故事信息。所以考古虽然在中国历史不长，但现在已被各界政府所关注。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是：如今几乎每个有能力的地方都在兴建以出土文物为素材的博物馆，也就是用考古叙事的方式，开展历史文化的话语竞争。这形成了一个表述中国的新传统。它在近代中国的形成，可从周口店发现“北京人”算起，然后到“元谋猿人”、中原“仰韶文化”的出土和传播，直到最近闻名的内蒙古“红山文化”和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等等，极大改变了世人对于“中国”、“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集体认知。

3. 语言人类学。它也在人类学的四个分支里面，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学科。不过由于如今人们对语言研究不感兴趣，所以对这一门类关注不多。并且由于受文化认同上的“本族中心论”限制，容易把语言学的视野和对象不知不觉地压缩为各自单一的母语，比如汉语，或藏语、蒙古语，同时对其他语种视而不见。然而作为人类学的早期支柱之一，语言学的研究对解释人类及其文化的作用是非常有力的。它的突出特征在于对人类的语言现象进行抽象和深层的结构分析，以及对不同人群的语言行为加以比较研究。

4. 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划分并不是全球性的，而是带有明显地域色彩，可称为人类学学科的一种“地方性知识”。此外，由于考古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因自身强大逐渐独立分家，即便在北美，人类学谱系也缩减为两个基本部分，即体质—生物人类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①

但是在欧洲，人类学的传统及构成却是三分的，还有哲学与神学的维度，合在一起的构成是：体质—生物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和哲学—神学人类学。

说到这一点，我们即能明白，在文学人类学背后隐藏的是两个学科、两大领域，同时是两种治学类型。整合起来，既代表了传统的人文学科，也体现着经典的自然科学。

四、类型开放：文学人类学在当代中国的探索和实践

文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兴起经历了几起几落过程。如果简约划分的话，可以大致分为1905—1949年和1949年至今的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的成果是奠基性的，其中的重要人物有闻一多、郑振铎、茅盾等。第二个时期在“新时期”以来的重启阶段，标志性成果出

^① 相关论述可参阅笔者文章：《回向“整体人类学”》，载《思想战线》，2008（2）。

现了多种不同的类型和面向。其中较为显著的有：

1. 经典与重释。“经典破译”是指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由思想解放运动催生的学术产物之一。在对西方“原型批评”的理论引进及创作界的“寻根文学”出现之后，学术界推出了一套名为“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其中有萧兵的《楚辞的文化破译》^①、叶舒宪的《诗经的文化阐释》^②以及臧克和的《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③等。对于丛书的主要成就，主编王孝廉的评价是，作者们“在传统文献的掌握和西方理论的认知两方面，取得平衡而又开拓出自己的见解”^④。而从今天的学科发展史角度来看，这套丛书及其倡导并实践的经典重释，可以说就是“新时期”中国文学人类学的重建标志。它的特点就在于尝试用人类学眼光和方法，对本土传统的文献表述重新解读，打破了过去，比如说仅用小学的方式对经典进行考据、训诂的惯例。当然，他们的结论并不都为学术界公认，有的甚至争论激烈。但它的确杀出了一条新的生路，引起很多有意思的讨论，乃至推出了文学人类学的新类型。

2. 原型与批评。此类型是把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运用于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实践。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以方克强、叶舒宪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连续发表了用原型理论分析中国作品的论文，其中包括《原型题旨：〈红楼梦〉的女神崇拜》^⑤、《原型模式：〈西游记〉的成年礼》^⑥以及《我国古典小说中的原型意象》^⑦等。

① 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② 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③ 臧克和：《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

④ 王孝廉等：《关于叶舒宪等“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的笔谈》，载《海南大学学报》，1995（4）。

⑤ 方克强：《原型题旨：〈红楼梦〉的女神崇拜》，载《文艺争鸣》，1990（1）。

⑥ 方克强：《原型模式：〈西游记〉的成年礼》，载《文艺争鸣》，1990（3）。

⑦ 方克强：《我国古典小说中的原型意象》，载《文艺争鸣》，1990（4）。

1992年，继叶舒宪编著的《神话—原型批评》^①之后，方克强出版《文学人类学批评》^②一书，对文学的人类学批评做了系统梳理，后来又在高校开设同题课程，向研究生们讲授“原始主义文学批评”、“神话原型文学批评”、“文学人类学批评的世界性潮流”等专题，把此类型的实践带入到体制内的教学系统中，扩大了文学人类学作为新兴学科在中国学界的影响与接受。

3. 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在中国新时期出现的另一类型是对“文学与仪式”的整合与研究。这方面的实践可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等为代表。彭兆荣早期做比较文学时关注希腊戏剧，分析过酒神精神及《金枝》故事后面的仪式象征。2004年，在他到海外就仪式课题做专门访学回来后，以丰富的第一手文献为基础出版了论述文学与仪式的专著，副标题就叫“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③

如今看来，文学人类学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对文学与仪式的关注。这不仅因为从人类学角度把文学与仪式相关联，更重要的是从理论上把文学也看成一种仪式。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作为一种类型，文学与仪式的研究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举个例子，仪式研究是人类学里的一个很重要领域。但不少人以为提到仪式就是古老的，都是远方和乡村的，要不就跟宗教、巫术相关，与现代都市的世俗社会扯不到一起。这是一种偏见。其实，在现代都市的世俗社会里，几乎每个人都逃避不了仪式的包围，从学校的开学典礼到全民的国庆大典，直至中外观众参与的“奥运会”、“世博会”开幕式、

① 参见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方克强：《文学人类学批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② 方克强：《文学人类学批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③ 参见彭兆荣：《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酒神及其祭祀仪式的发生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授奖式……哪一处不是意味深长的仪式？^① 哪一个不值得文学和人类学进行分析和阐释？至于将文学和仪式结合最为紧密的事例，无疑是每日在世界各地频频出现的“国歌”高咏和列队“升旗”。在奏国歌和升国旗的仪式里，伴随着的文学就是歌词。在神圣庄严的音乐中，人们面对国旗起立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时，你说文学不是仪式是什么？

不过，结合现实的研究状况看，文学与仪式的类型在中国可谓方兴未艾，还需要大家开掘和努力，继续突破过去的文本限制，把目光从单一的言辞、书写等分类模式中超越出来，把文学视为仪式，当做生活场景中动态的、交流的文化事象。

4. 民歌与国学。这一类型的实质是力图从文学人类学视角打通中国文化中“官—士—民”结构，以及将精英的书写与民众的口传连为整体。在这方面笔者做了一些尝试，开初是为了梳理侗歌民俗的研究背景而对民国时期的“歌谣运动”加以回顾，后来发现此背景的学术史意义重大，便做成了一个专项课题，出版的书就叫做《民歌与国学》。此领域的相关成果不少，如海内外学者的《到民间去》、《目光向下的革命》等。^②

顺此思路，再加上对贵州和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田野考察，笔者后来出版了《侗歌民俗研究》^③，意图与上述初衷仍是一致的，那就是在国家话语与国学叙事形成统摄的前提下，考察并阐释民族、民间和民俗的文学表达——当然，这里的文学指的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大文学”或曰“活态文学”、“草根文学”乃至“生命文

① 参见《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3（1），有关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文学人类学专栏文章。

② 参见徐新建：《民歌与国学》，成都，巴蜀书社，2008；[美]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董晓萍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③ 徐新建：《侗歌民俗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学”与“神性文学”。相关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朝戈金对丝绸之路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的现状考察、罗庆春对彝族母语文学的研究和继承^①，以及梁昭及陆晓芹、廖明君等对刘三姐与壮族歌圩的研究^②等。

5. 神话和历史。把神话与历史作整体看待称得上是文学人类学在新时期以来的第三种类型。代表性成果是叶舒宪团队推出的几套相关丛书。在笔者看来，从人类学角度对神话和历史进行的分析和阐释，对于文学人类学的中国实践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延续并评述中国这一自古注重世代传承且存有丰富文献与口传遗产之大国的族群记忆。

在“五四”“新文学”以来的体系里，神话也开始在文学教材里出现。其中会提到希腊的神话、中国的远古神话以及世界上一些少数族裔的神话（传说）。不过由于过度强调进化论观点，使得对神话的解释添上了“过去”、“异邦”和“蒙昧”、“落后”等色彩。如今的研究逐渐以结构—功能主义替代进化主义，更多从文化相对主义和多元论出发来看问题，对神话有了更为宽容和宽泛的理解，同时也以可谓“新神话观”的立场为基点，对包括文学和历史等在内的族群记忆进行进一步阐释。为此，叶舒宪从文学与历史整合的角度提出重新阐释“神话中国”，呼吁学界从文学视野的“中国神话”，转到文化整体视野的“神话中国”。^③

此外，从文学人类学出发对神话与历史的研究还进入到将古代

① 参见朝戈金：《中国西部的文化多样性与族群认同：沿丝绸之路的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现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罗庆春：《穿越母语：论彝族口头传统对当代彝族文学的深层影响》，载《民族文学研究》，2004（4）。

② 参见梁昭：《民歌传唱与文化书写：跨族群表述中的“刘三姐”事象》，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陆晓芹：《歌圩是什么——文人学者视眼中的“歌圩”概念与民间表述》，载《广西民族研究》，2005（4）；廖明君、陆晓芹：《山歌好比春江水——广西少数民族歌谣文化通览》，载《广西日报》，2011-08-10。

③ 参见叶舒宪：《中国的神话历史：从“中国神话”到“神话中国”》，载《百色学院学报》，2009（1）。

文本与当代社会彼此关联的对照之中。一批史学家对“炎黄子孙”、“黄帝崇拜”以及“英雄祖先”与“兄弟故事”等现象的梳理和论述，即可视为此中的重要成果之一。^①与此同时，艺术界与学界对“狼图腾”与“龙传人”等新神话表述的展现和论争，也堪称对此的热烈回应。^②在后一种论述框架中，神话就活在当代，呈现在包括中央电视台新闻在内的“海外华人祭拜炎帝黄陵墓”与河南、贵州等地修建缅怀炎帝、黄帝和蚩尤的“三祖堂”等事件中。

6. 多民族文学与表述问题。最近几年以来，围绕多民族文学与表述问题的讨论逐渐成为文学人类学呈现在中国学界的新趋势。2001年由徐其超和罗布江村主编的《族群记忆与身份创造》，便已倡导用人类学理论阐释中国的多民族文学。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在该书的“序言”里，强调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以“艺术观念的更新、表现手法的多样化以及艺术审美旨趣的多元追求”，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更富自然灵性和人性原质的全新元素”。^③同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及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发起的“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聚集来自中国各地尤其是各民族地区的学者、作家就中国文学的多元性展开对话和讨论。2007年以后，论坛又

① 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沈松乔：《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载《台湾社会研究》，1997（12）；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载《历史研究》，2000（3）；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2（3）。

② 可参阅姜戎：《狼图腾》，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徐新建《“龙传人”与“狼图腾”：当代中国的民族身份表述》，载《民族文学研究》，2006（4）。

③ 徐其超、罗布江村主编：《族群记忆与身份创造·序》，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

将焦点延伸为对“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呼吁和论争。^①这样的趋势表明了文学人类学朝文学多元性方面的阐释扩展以及对民族书写的理论整合。

随着以上问题的研讨深入，表述问题日益成为文学人类学关注的又一个焦点。笔者提出的看法是，应把表述问题视为文学人类学的“起点和核心”。^②2010年10月在广西南宁召开的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五届学术年会的主题是“表述‘中国文化’：多元族群与多重视角”。2012年在重庆举办的第六届年会上则设立了有关“文化表述”的专题论坛，除了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学者外，还邀请王明珂、赵毅衡等多学科学者一同对话，使对“表述问题”的研讨扩展至更为广泛的交叉领域。^③

以上方面大致体现了文学人类学在当代中国的基本历程及主要特征。其他方面的相关成果还有不少，如“多重证据”、“文化遗产”、“民族志文本”和“人类学写作”等。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五、结 语

总体说来，作为一门横跨文理两边的新兴学科，文学人类学在当代中国的探索实践可谓刚刚起步，今后的发展不但需要从业者们的加倍努力，还需要更多有志于学科交叉与整合之同道的关心和扶持。作为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长期参与者，我期盼能与大家一道，

① 参阅关纪新：《应当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载《中国民族》，2007（4）；曹顺庆：《多民族文学史的编写问题——重新建立中国文学史观》，载《民族文学研究》，2008（2）；徐新建：《“多民族文学史观”简论》，载《民族文学研究》，2007（2）；姚新勇：《“族裔民族主义”思潮与中国多族群文学的立场选择》，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6）；潘年英、杨曦：《“多民族文学史观”之管见》，载《民族文学研究》，2008（2）。

② 徐新建：《表述问题：文学人类学的起点和核心》，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1）；《表述中国：帝国和民国的历史叙事》，载《社会科学家》，2012（2）。

③ 参见《社会科学家》2013年第2期有关“文化表述”的文学人类学专栏文章。

为使文学人类学能在当代学术的土壤里开花结果作出贡献。

如今，在民族出版社的积极支持下，我们组织推出了这套以“文学人类学博士文丛”为名的学术丛书。其中的撰稿者多为近年来活跃于文学人类学领域的青年。她/他们提供的书稿有的即为自己的文学人类学博士论文，有的则是以文学人类学为基点拓展开来的学术新著。其中的论题既有对中国南部非汉民族的口头传统的论述和对20世纪彝学研究的历史评述，也有从民族博物馆反思文化表述的理论与实证考察。我们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学者加入进来，积少成多，把文丛汇集为文学人类学新成果的又一展示地。

2013年4月3日，于成都望江楼